

《愤怒的葡萄》中的生态危机意识

孙 珊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5)

摘 要: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其小说、散文和游记中都表现出超前的生态危机意识和鲜明的生态思想。写在美国大萧条和沙尘暴时期的《愤怒的葡萄》就是一部充满生态危机的小说。本文运用生态主义观点探讨斯坦贝克在小说中所揭示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等方面的生态危机。

关键词: 斯坦贝克 《愤怒的葡萄》 生态危机

一、引言

《愤怒的葡萄》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描写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大批农民破产,被迫从沙尘频繁的俄克拉荷马州平原移民到加利福尼亚谷地的故事。《愤怒的葡萄》自1939年出版以来,就引起美国社会与文学评论界的普遍关注,批评家 and 学者们从社会各个角度解读该小说的文学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批评流派在英、美的确立,文学评论家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斯坦贝克及其小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发表于1997年的《〈斯坦贝克和环境〉:跨文化研究》。在这部著作中,美国文学博士大卫·N·凯苏图(David N.Cassuto)从水文学角度探讨造成大批农民西迁的困境的原因。加拿大布兰登大学罗莱科德斯道姆教授(Lorelei Cederstorm)用大地母亲意象分析了《愤怒的葡萄》中乔德妈妈和罗莎香众神之母的形象。因此,本文在批判地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愤怒的葡萄》中所体现的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个层面的生态危机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危机斯坦贝克所作的有益尝试。

生态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90年代迅速发展于英、美的批评浪潮。生态批评理论家格罗特费提(C.Glotfelty)对它的定义是:“简单来说生态研究就是研究文学和物质环境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去审视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给文本阅读带来了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阶层的意识一样,生态批评对于文学研究采取的是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1996:31)因此,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教授明确指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唤醒读者的生态意识,使其重新认识人类的生存现状,关怀处于危险的地球。中国生态批评家鲁枢元更是进一步提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解救地球的生态困境,修补地球精神圈。因此生态研究通过文学文本来考察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以便实现自然与人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自身的普遍和谐。

事实上,写在美国大萧条和沙尘暴时期的《愤怒的葡萄》就是一部充满生态危机的小说,真实地揭示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的生态危机问题,即人类对土地的剥削、对抗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态的缺失。

二、自然生态危机:人类对土地的剥削

俄克拉荷马州位于美国南部大平原,这个大平原地跨数州,其面积约占美国本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曾被美国诗人惠特曼称为北美典型的景观。然而在斯坦贝克的笔下,那里却成了沙尘肆虐之地。大平原原本只有少数印第安人居住,但是随着1862年《宅地法》的颁布,越来越多的白人来到了大平原,赶走了印第安人,开始发展畜牧业。到19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美国日益增加的粮食需求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润,人们开始开垦土地,发展种植业。为了从土地中获取更大的利润,大型机

械不断被引进,逐渐生产方式也由原来的家庭种植发展成了商业化种植。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植被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并被大面积过度开垦,因此一遇到严重干旱和大风时,土壤就严重沙化,最终导致了30年代的大沙尘暴现象。

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的开始就展现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尘肆虐和庄稼尽毁的景象:“俄克拉荷马的红色原野和一部分灰色原野上,最近不紧不慢地下了几场雨,雨水并未冲裂结了一层硬壳的土地……灰蒙蒙的天空出现了一轮红日,那只是一个朦胧的红色圆盘,放射出微弱的光线,好似黄昏一般;过些时,阴暗的天色变成了一片漆黑,风在伏倒的玉米呜呜地悲鸣。”似乎土地的贫瘠和庄稼的被毁是由长期干旱袭击和暴雨的侵蚀造成的,但是斯坦贝克却暗示了事实并非如此。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南部大平原的开发过程就会发现沙尘暴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类自身对大自然的破坏,以及其追求利益的价值观念。事实上,许多佃户已经意识到是自己几代人的贪婪引发了现在的沙尘现象。他们知道土地越来越糟了,是棉花把土地弄坏了,吸干了地里的血。“蹲着的人点点头——他们知道,田野知道。如果他们可以轮种各种各样的庄稼,那也许可以给土地输血吧。”轮种是一种保护土地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为了追求利润,佃户们只会连续种植一种高额利润的作物。“我还记得我们每年庄稼起初都长得挺好,可就是到了收割的时候不行了。我爷爷说起初种的那五次,地里还有野草,收成是挺好的。”即便佃户们意识到了轮种和保护土地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再有另一次机会,他们依然我行我素:“天知道明年棉花的收成会有多么好。况且还有打不完的仗——天知道明年棉花的市价会涨到多高。人家不是用棉花做炸药、做军装吗?只要老打仗,棉花的价钱就会涨上天。”因此,农民们对土地的开垦是破坏大平原生态的一个重要环节。

此外,除了佃户们对土地的有意识的破坏,大土地业主也是大平原的征服者。为了满足对利润的追求,大业主们利用现代化机器和资金对土地进行变本加厉的掠夺。“拖拉机后边滚着亮晃晃的圆盘耙,用锋刃划开土地——这不像是耕作,倒像是外科手术。一排圆盘耙把土划开,掀到右边,另一排圆盘耙又把它划开,掀到左边;圆盘耙的锋刃都被掀开的泥土擦得亮亮的。圆盘耙后面拖着的铁齿耙又把小小的泥块划开,把土地均匀地铺平。”大土地业主用拖拉机用锋刃随意地切割土地、蹂躏土地,没有一丝同情之心。更严重的是,这种大机器的运用会渐渐地割断土地与人类亲密的关系。“土地在铁的机器底下受苦受难、在机器底下渐渐死去;因为既没有人爱它,又没有人恨它。”人与土地的关系渐渐疏远,土地不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而是利润的附属品。人类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必然会引起大自然的愤怒,在《愤怒的葡萄》中具体体现在沙尘暴的肆虐上,而正是这些沙尘暴使成千上万亩农田被毁,千万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三、社会生态危机:对抗的人类社会

中国学者王诺教授认为生态文学应致力于文明批判,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米尔布思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1993:361)因此在《愤怒的葡萄》中,当斯坦贝克批判了自然生态危机之后,就着重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态危机。

当背井离乡的农业移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后,他们就遭受了当地人在经济 and 制度上的蔑视,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

冲突。为了维护加州的利益,移民们一入境就得接受守兵的检查,看他们是否携带蔬菜和树苗,事实上移民们时时刻刻都要面临警察的驱逐和侮辱。当乔德一家来到科罗拉多河岸的时候,一个警察来到帐篷前说:“你们到加利福尼亚来了,我们不要你们这些讨厌的俄克佬住下来。如果我明天来的时候你们还在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把你们赶走。”“俄克佬”的意思本来指的是俄克荷拉马人,但是现在这个称呼在加利福尼亚人的眼里逐渐演变成了下流杂种和废物。

面对一无所有的移民,加利福尼亚人并没有给出应有的同情和帮助,他们考虑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在加州,有产业的人为了财产而担惊受怕,工人们为了饭碗而担心,于是市镇上和舒适的郊区的人聚拢来自卫了。他们组成队伍,用棍棒、瓦斯、机械武装起来,像要驱逐侵略者一般防御自己同胞的“侵袭”。同时,不停的流动生活,吃不上饭的孩子,饥饿的恐怖和饥饿本身,以及遭受的敌意使得流民团结起来对抗当地市民的冷漠,警察的驱逐、殴打和关押,以及大业主的乘机敲诈和恶意排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业主们发出更多的传单招来更多的雇农,并肆意压低雇农的工价,通过毁坏粮食来提高物价。于是,这种对抗的结果出现了:“田野里收成很好,挨饿的人却在路上流离失所。谷仓里装满了粮食,穷人的孩子却害得瘦弱,身上还生着糙皮病和脓疮。”(285)

深生态学认为:“小我存在于大我中,当整体面临危险时,没有一个能够获救,除非全体都获救。”(Naess,1995:226)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只有在整体生态系统和谐中人类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如果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社会必定存在一定的生态危机。通过描写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的不幸,斯坦贝克谴责了当时美国社会上的不和谐因素。

四、精神生态危机:精神家园的丧失

精神生态是研究精神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鲁枢元,2006:198)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恶化必然对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因此,在分析了自然和社会生态危机后,斯坦贝克探讨了移民的精神生态危机,即他们对土地和家园精神依恋的丧失。

俄克荷拉马州不仅代表着移民的家园,而且是他们的精神依靠。一旦离开原来的生活场所,他们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孤独感,像一个坟地上的鬼魂到处游荡在生活过的土地上。在小说中斯坦贝克塑造了两种类型的人:缪利和乔德爷爷。作为坚持留在俄克哈拉玛州的代表,即便家人全部离开了,缪利一人依然在土地上到处流浪。“我呢,只好到处流浪。不过是在这近处转来转去,并没有走多远。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睡觉……我不过是在四处流浪,像坟地上的鬼一样。”“像坟地上的鬼一样,四处流浪”在小说总共出现了五次,充分表达了以缪利为代表的移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乔德爷爷则从另一方面表达了移民对家园的依恋。虽然乔德家爷爷在离乡的前夕幻想着到富饶的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幸福的生活:“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我要一天到晚把一大把葡萄捧在手里,随时想吃,就咬下来吃,那可好呀。”但是真正到了离开的时候,乔德爷爷就目光呆滞不愿意离开他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我是这地方的人。这么一想,哪怕别处的橙子和葡萄一直堆到床上来,把人挤掉,我也不稀罕了。我不走了。这地方并不好,可终究是我的家乡。”当乔德爷爷被迫离开了家乡,特别是跨过俄克拉荷马州界时,他就带着对生活传统的依恋死去了。事实上,乔德爷爷并不是在跨过州界那一夜死去的,根据凯西的话:“爷爷和老家是一回事,爷爷并不是今晚上去的,你们把他带着离开了老家,那时他就死了。”在西进的过程中,即使来到了梦想中的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停地迁徙。乔德一家自从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就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住白色的漂亮的小房子,有固定的工作。相反,在移民过程中,他们一家最珍视的家庭成员相继离去,从原来出发时的13人到最后仅剩5人。

俄克荷拉马州自然环境的破坏使人们失去了生活的家园和对传统、对过去的精神依恋,加利福尼亚州的种种不幸又打碎了他们的梦想,扭曲了他们人性,使得一部分移民,如诺亚和康尼,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抛弃责任和家人。

五、结语

作为一位有深刻生态危机意识和伟大生态思想的作家,斯坦贝克在小说中不仅表达了对上述生态危机的担忧,而且试图找到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法。为了解决自然生态危机,斯坦贝克号召人们应该回归自然,敬畏土地;为了解决社会生态危机,他倡导陌生人之间的互助;为了解决精神生态危机,他在人们内心提倡普爱精神。

首先,为了解决自然生态危机,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斯坦贝克在小说中塑造了典型的人物:牧师凯西。当凯西第一次出现时,他躺在大地上的树荫下,用他的脚趾掘着泥土。这样细节的刻画在文章出现不至一次:“有一个人靠着树干,坐在地上。”“树干的浓荫里那个人把交叉的双腿放开,用脚趾掘着泥土。”通过上述细节描写,斯坦贝克强调了凯西和土地、自然的紧密联系,就连凯西的醒悟也是在荒原里完成的。此外,斯坦贝克还向读者展示自然之美:“阳光照射在草地上,草地暖洋洋的,草地阴影里有各种昆虫在活动,蚂蚁和蚂蚁忙着布置捕捉昆虫的陷阱,苍蝇向空中跳起,轻轻地拍一拍翅膀,潮虫用许多细脚像蜘蛛一般慢慢腾腾地踱步。”正是通过描写人们对土地、对自然的热爱,斯坦贝克表达了他希望重建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其次,为解决社会生态危机,斯坦贝克深情地赞扬了陌生移民之间的互助。在西进的过程中,乔德一家的第一个营地是个有意义的地方,在那里他们遇上了威尔逊夫妇,两家结成了联盟。尽管当时威尔逊夫人已经生病了,但他们仍然接纳病危的爷爷。爷爷突然死于中风,他就死在了威尔逊家的帐篷里。威尔逊一家的友善得到了回报,奥尔提出帮助他们修理那辆抛锚的汽车。斯坦贝克强调了这些农业移民的互助友爱精神,互不相识的农业移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道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正是通过这种陌生移民间的互助精神来解决社会生态危机中的对抗关系,倡导人和人的和谐相处。

最后,针对农业移民的精神危机,斯坦贝克提出了在移民中倡导普爱精神。人类内心的普爱精神能够把人从原来只想着自己发展到想着别人,最终在大家共同的灵魂中找到归依。正如凯西倡导的:“所有的人有一个大的灵魂,那是大家所共有的,自己的灵魂只不过是大家灵魂的一小部分。”在这样的大灵魂中,那些失去了精神依恋的居无定所的农业移民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

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通过对乔德一家不幸遭遇的描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自身精神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作为一个有生态忧患意识的作家,斯坦贝克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的生态危机,显示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的今天,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去解读《愤怒的葡萄》,挖掘书中的生态思想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可以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有益的帮助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Beegel,Susan,Susan Shillinglaw and Wesley N.Tiffany. Steinbeck and the Environment: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7.
- [2]Bookchin,Murray.What is Social Ecology?Environment Philosophy: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Ed.Michael E. Zimmerman et al.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93:354-373.
- [3]Glottfelty,Cheryll Il.Introduction:Literary Studies in an Age of Environmental Crisis.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Eds.Cheryll Glottfelty & Harold Fromm.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
- [4]Naess,Arne.Self-realization: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Being in the World.Deep Ecology for Twenty-first Century.Ed. George Sessions.Boston:Shambhala Press,1995:225-239.
- [5]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6]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惠译.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

哈代诗歌解读

张立斯

(大连艺术学院 基础部,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托马斯·哈代不仅是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是英国20世纪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歌在英国诗坛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哈代的抒情诗入手,对哈代的诗歌与创作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哈代 诗歌 悲观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英国诗歌巅峰的浪漫主义大潮已经成了遥远的往事,随着丁尼生和勃郎宁的逝世,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余波彻底衰落。整个英国诗坛似乎只是在等待着另一次高潮的来临,比起主流的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显得落寞而孤寂。但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时代的诗歌空白,他就是托马斯·哈代。

因为哈代所取得的杰出的小说成就,他的诗歌常常为人所忽视。但是,哈代的诗名到了20世纪后期日益隆起,已经丝毫不逊色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名声,而这也是哈代本人生前所乐于看到的。其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诗歌的偏爱,宁愿被别人称为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因为在哈代看来,诗歌比小说更高雅,更能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受限制。哈代最早走向文学道路就是从诗歌起步的,他曾仔细阅读过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等人的作品,在伦敦作学徒期间就开始尝试写诗,他早期的诗作《无色的音乐》、《深思的少女》情感真挚,富有想象力,意境深远,展示了他的诗歌才华。而在写作小说期间,哈代仍然坚持诗歌创作,当《无名的裘德》遭受到评论界的抨击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诗歌创作,在189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威塞克斯诗集》后,哈代接连出版了8部诗集,包括《时光笑柄集》、《环境讽刺集》、《今昔抒情诗集》等,诗歌创作多达918首,最后一部诗集《冬天的话》于1928年他去世后出版。

如果说哈代创作的小说有一种诗的意境,那么他创作的诗歌则属现实主义。哈代写诗冷静、严肃,甚至略带嘲讽地观察人们日常生活的希望与恐惧、困惑与迷惘、喜与悲、苦与乐,而且诗作大多具有自传性。正如他的第二位妻子弗洛伦斯所说:“要了解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1]哈代抒情诗有四类题材,即爱情、自然、战争和死亡,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主要领域。

在西方文化中,爱情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可以说,爱情即人生。在文学作品中讴歌爱情的美好和美妙一直是其长盛不衰的传统。哈代是珍惜爱情的,他那一千多首诗中,有不少是歌颂爱情的力作。哈代的爱情诗真挚纯朴,深切感人,体现了他丰富的感情世界和敏感的内心感触。特别是在1912至1913年间为追忆第一位妻子埃玛而作的总题为“旧焰余烬”的组诗,用词质朴,情真意切。哈代与埃玛年轻时的热恋曾轰轰烈烈,婚后初期也是琴瑟和谐,但其后的生活却并不美满。哈代喜欢结交少女,而埃玛对此则极为不满,两人的感情自然很难融洽。1912年埃玛去世后,哈代对她思念不已,他曾同他一起度过人生最幸福时刻的女人的突然离去感到震惊

和悲痛,并把自己的情思写入诗中來传达他在埃玛去世后的心境。

哈代诗中另一频繁出现的题材是自然。尽管自然从来不曾是他的主题,仅仅作为人类活动的背景,但他依然是一位热衷描写自然的诗人。哈代一生写过近百首自然诗,是其诗歌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长年居住在乡村,他对乡村生活和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哈代的诗歌长于对大自然景观的描绘,并寓情于景,表达他对自然万物的热爱。在他的诗歌中,仿佛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风雨雷电、飞禽走兽都具有了人的情感。尤其是对树枝的描写,达到了活灵活现的地步,有人甚至称呼哈代为“树枝诗人”。他对自然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他从自然万物的悲剧性中看到了人类的悲剧命运。虽然对于哈代来说自然是灾难的承受者,本身有许多不和谐因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均充满着残酷的竞争,然而他在自然诗中从来没有让人们放弃生存意志,而是将希望寄托于人这一大自然中特殊的群体,寻求着人与人之间的爱,希望人们用坚韧和刚毅的态度来对待生存的痛苦。所以对于大自然,哈代既不像他的前人那样顶礼膜拜,又不是简单地回避。在继承华兹华斯的一部分思想的同时,他又抛开了华兹华斯积极向上、充满希冀的一面。他试图在大自然中找寻智慧、善良与美,但又在诗中展现自然阴暗残酷的一面,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自然观。

哈代试图从自然中寻找善与美,可是又难以掩饰他内心的荒凉,因此,他所描写的自然经常呈现出阴惨萧瑟的景象,这也是因为哈代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所自然流露出的情感,而这两个方面也是哈代诗歌经常涉及的主题。哈代生活的年代,英国经历过英印锡克战争(1845—1846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英阿战争(1838—1842年、1878—1891年)、第二次英缅战争(1885—1886年)、英布战争(1899—1902年)、几次入侵中国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多次重要的国际战争。战争对哈代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哈代一生写了40多首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他的战争诗在他的全部诗作乃至英国的战争诗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战争,哈代是明确反对的。1899年当英国发动侵略南非的战争时,他曾以《离别》一诗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作于1902年的《他杀死的人》则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荒谬。此外,哈代还写了诸如《士兵的妻子和恋人之歌》等不少优秀的反战诗。哈代认为,战争是对生活的否定,是对人性的摧残,在战争中人性被扭曲,真善美被摧残。在其战争诗中,哈代揭示了战争的荒诞性和邪恶性,对战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揭示了战争给人类生存状况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同时也流露出悲观的情绪。

战争必然会带来死亡,暮年的哈代越来越感受到死亡的阴影。哈代活到87岁,亲朋好友大多先他而去,难免有不胜感慨之叹。哈代在《他在她的葬礼》等诗歌中以低沉哀婉的笔调

大平原,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

[7]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谢江南,尘暴与《愤怒的葡萄》中的生态价值观,外国文学,2008,(4):98-100。

[9]约翰·斯坦贝克著,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